

海上丝绸之路丛书



陈瑞德 刘如仲 著
傅冰 石瑄

海上丝绸之路的

友好使者·西洋篇

海洋出版社

海上丝绸之路丛书

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

——西 洋 篇

陈瑞德 刘如仲 著
傅 冰 石 瑄

海 洋 出 版 社

1991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介绍了为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和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八位历史名人，他们是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唐代高僧义净、旅行家杜环，元代旅行家周达观、航海家汪大渊，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泰。名人传列翔实、生动，重点突出，兼及时代特点，读来颇有新意，实为广大读者的有益读物。

6032 15
(京)新登字087号

海上丝绸之路丛书

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西洋篇

刘如仲 陈瑞德 著
傅冰 石瑄

*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375 字数：110千字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00

*

ISBN 7-5027-0081-1/K·4 定价：4.90元

目 录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1)
1. 丝绸的故乡和丝绸的输出	(1)
2.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3)
3. 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著名人物	(6)
二、巡礼佛国的晋代高僧法显	(9)
1. 佛教东传	(9)
2. 法显西行	(11)
(1)法显的身世	(11)
(2)长安发迹 结伴同行	(11)
(3)西渡流沙	(12)
(4)西域见闻	(12)
3. 佛国巡礼	(14)
(1)在北天竺和西天竺	(14)
(2)最早来到中天竺的中国僧人	(16)
4. 南海归航	(19)
5. 世界名著《佛国记》	(21)
三、唐代高僧义净往返于“海上丝绸之路”	(25)
1. 泛舶南溟 巡礼西天	(25)
2. 著述室利佛逝	(29)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29)
(2)《南海寄归内法传》	(30)
四、第一个抵达地中海海滨的唐代旅行家杜环	(33)
1. 怛逻斯之战	(33)

2. 杜环不寻常的远足旅行	(35)
3. 杜环的旅途见闻——《经行记》	(35)
(1) 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	(36)
(2) 关于伊斯兰教最早而正确的记录	(38)
(3) 有关拂菻等国的风土人情、社会生活的记载	(39)
4. 稍晚于杜环的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	(39)
5. 宋代有心人的耳闻笔录	(43)
五、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	(47)
1. 马可·波罗东行时的中国	(47)
2. 马可·波罗到中国	(49)
(1) 跋涉在“丝绸之路”上	(49)
(2) 在中国十七年	(51)
(3) 重返威尼斯	(54)
3. 《马可·波罗游记》	(56)
(1) 记载大元帝国初年的政事和历史	(56)
(2) 介绍了元代中国的富强和文明	(59)
(3) 提供了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有用资料	(63)
4. 友谊的桥梁	(65)
六、元代旅行家周达观和《真腊风土记》	(68)
1. 悠久的历史交往	(68)
2. 《真腊风土记》	(70)
(1) 元代中柬的海上交通	(71)
(2) 灿烂的吴哥艺术	(71)
(3) 丰富的生活画面	(73)
(4) 友谊的记录	(74)
七、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和《岛夷志略》	(76)
1. 汪大渊的身世	(76)
2. 两次远航	(77)
(1) 中南半岛见闻	(78)
(2) 周游印度沿岸	(81)

(3) 远及东非、北非·····	(83)
(4) 漫游小东洋·····	(85)
(5) 穿行在岛群之中·····	(85)
3. 《岛夷志略》·····	(88)
八、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泰漫游中国 ·····	(93)
1. 伊本·巴图泰游历中国三大名城·····	(94)
2. 《伊本·巴图泰游记》所介绍的中国·····	(96)
九、七下西洋的明代航海家郑和 ·····	(99)
1.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	(99)
(1) 郑和的身世·····	(99)
(2) 下西洋之准备·····	(100)
(3) 船只和航海技术·····	(101)
2. 郑和下西洋·····	(105)
(1) 首航南洋及印度洋东岸国家·····	(105)
(2) 再航东南亚诸国·····	(109)
(3) 横渡印度洋远航·····	(113)
(4) 远航东非各国·····	(116)
(5) 榜葛刺及天方之行·····	(119)
3. 下西洋促进了经济和文化交流·····	(123)
(1) 取宝与通商往来·····	(123)
(2) 郑和与文化交流·····	(126)
4. 十五世纪中外人民对郑和的纪念·····	(131)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1. 丝绸的故乡和丝绸的输出

采桑养蚕，缫丝织绸，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创造。在古代历史上，中国以“丝绸的故乡”、“东方丝国”而知名于世。

从陕西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一件保留着清楚的纱罗印痕的陶碗；山西夏县西阴村灰土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过一个被切割过的蚕茧；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丝织物残片；1959年江苏梅堰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饰有蚕纹的黑陶器。由此可见，至晚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已经生产丝绸了。

到了公元前十六至十一世纪的商代，丝绸不仅是统治阶级的生活必需品，而且也是他们死后的随葬品。丝绸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生产技术也有提高，至迟在这个时代，已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1950年河南安阳商代贵族墓中出土的铜钺上，保留着织成回形几何纹细绢的残迹。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时代，“织锦”已经出现了。这是一种多彩织花的高级丝织物。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的西周贵族墓和山东临淄的东周贵族墓中都有出土。它反映了丝织技术和织花工具的进步。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的秦、汉时期，丝织物不仅品种繁多，而且质地也更加精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包括目前已知的汉代丝织物的大部分品种，包括绢、罗、纱、锦、绣绮

等。颜色有茶褐、绛红、灰、朱、黄棕、棕、浅黄、青、绿、白等。花纹的制作方法有织、绣、绘。纹样有各种动物纹、云纹、卷草纹、变形云纹、菱形几何纹等多种纹饰。而且还发现了用以书写和绘画的丝织品实物：帛书和帛画。这说明汉代丝织业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为丝绸的大量输出创造了条件。

在公元前四至六世纪，丝绸已经输出到西亚；公元前四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代，已经输出到南亚了。无可怀疑的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丝绸确实已传到中亚，在今苏联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的古墓中出土了中国的丝绸，有刺绣和织锦，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

丝绸输出到西方的罗马，最初是通过西亚输运去的。古代西方的衣料，主要是羊毛和亚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不仅不生产丝绸，也不了解丝绸是怎样制成的，他们不相信锦是织成的，误认为是“有虫食树叶吐丝而成”。当丝绸这种柔和舒适的衣料传入时，在罗马的市场上，丝绸几乎与黄金等价。据说当年罗马的凯撒大帝穿着中国丝绸袍子上剧场，受到人们的非议，认为他太奢侈了。可见丝绸是一种异常昂贵的珍品。直到公元一世纪，罗马作家蒲林尼在其名著《博物志》中还认为：“赛里斯国（意为产丝之国）”“林中产丝，驰名字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然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直到公元二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包撒尼雅斯才指出：赛里斯人用以织绸缎之丝，“非来自植物”，而是一种“希腊人称之为塞儿”的虫，“所吐之物，类于细丝”，但是他也没有见过蚕，只说这种虫“与树结网蜘蛛相似，蜘蛛八足，该虫亦有八足”。

丝绸的大量输出还是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后的事情，而丝织技术的西传则至早也在公元四世纪以后。

公元前138至前126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开辟了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通过中国新疆地区，进入中亚到西亚，直抵地中海东岸的通路。这就是输出中国丝绸的陆上“丝绸

之路”，是由骆驼商队进行贩运的。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开始把这条当年骆驼商队贩运丝绸的干线，称为“丝绸之路”。翻开地图一看，“丝绸之路”是由中亚和西亚的沙漠、高原地带里的一个一个绿洲连贯起来的，所以有人又称它为“绿洲之路”。

穿过绿洲的“丝绸之路”，是一条主要的干线。除此之外，在陆地上，还有两条丝绸之路，一条通过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另一条通过西南的山林地带。同时，丝绸的输出还有一条越来越重要的线路，那就是通过南海的航线，即“海上丝绸之路”。

2.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统一了南粤以后，便派出使者访东南亚各国。访问的航线是从广东雷州半岛启航，途经今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横渡印度洋到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腊姆）及斯里兰卡（详见：《汉书·地理志》）。使者“赍黄金杂缯（锦）而往”，“市明珠、碧琉璃（等）奇石异物。”这是我国史籍上关于丝绸作为商品输出到东南亚以至南亚各国的最早记录。这条南海航线，就是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条航线上，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东南亚和南亚各国。

当时，强盛的古罗马帝国是丝绸消费大国。但是东西方丝绸贸易主要控制在安息人手里，由于丝绸贸易获利巨大，所以安息维护它的丝绸贸易的垄断地位，千方百计地阻碍生产大国的中国和消费大国罗马之间的直接联系。中国和罗马也都为摆脱这种控制而作出过努力。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试图建立两国之间的正式交往，可是甘英受安息人之阻，未能成行。但汉时已知“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即古罗马帝国）”，即从波斯湾东出阿蛮（阿曼），绕阿拉伯半岛经亚丁入红海，可至大秦。当时红海东西岸都是罗马属地。另一方面，罗马人发现印度洋季风，开辟出红海渡印度洋的航线后，“与安息、天竺交市海中，剩有十倍……其主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与汉缯（锦）彩与之

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后汉书·大秦传》)。不过，海路毕竟不象旱路那样可以严加封锁，所以在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西域传》)当然，这很可能是罗马商人假借罗马王的名义向汉朝致意，以换取丝绸贸易的便利。

直到唐代，丝绸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朝贡贸易”的色彩。各国带来的珍宝特产，以“朝献”的名义输入，而丝绸则以“回赠”的形式输出，不是单纯的商品贸易，而是带有敦睦邦交的政治意义。

发展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必须要创造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要有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自汉朝以来，中国的造船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已经能建造相当大的海船，公元230年，吴主孙权派遣吴国水军卫温、诸葛直率军一万东渡台湾，又派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访问扶南。他们所乘船只都是相当大的，仅载马就达八十匹，大者“张七帆”，有的“长二十余丈”，“载六、七百人”。在航海技术上，隋代已经掌握了利用多面风行船。如隋代裴矩就曾“以蛮夷朝贡者”向隋炀帝建议在洛阳兴建“掌番率蛮夷与民贸易”，这就是说以朝贡名义来华的外商日益增多，开始重视海外贸易的表现。这时造船能力也大大提高，隋炀帝游幸江都所乘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阔五十尺，四重”，各类船只近千艘，这支庞大的船队排列在运河上，前后延伸近二百里。可见当时的造船能力。1975年在山东平度县胶莱河东岸，出土一条隋代近海木船，长二十多米。这时期总的来说，造的船舶还是以内河船和近海船为主，虽然远洋海船也相当大，如法显回国时所乘中国海船可乘二百余人，船后还有备用船，在航行上也掌握了“望日月星宿而进”的天文导航法。可是相对来说，这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还是不发达的，远洋航行还带有相当大的风险。如法显从狮子国启程东行二日遇大雨，便“船漏水入”，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多天，才在耶婆提靠岸，从耶婆提北上又遇“黑风暴雨”，“天

多连阴”，迷失航线，偏向东北。本来从耶婆提到广州只需五十天，结果行了七十多天才到达胶东半岛（详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这个时期大宗的丝绸输出，还是依靠陆上“丝绸之路”。

从唐代（公元618—907年）中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逐渐代替了陆上“丝绸之路”，从此成为丝绸贸易的主要干线。而“海上丝绸之路”延续时间之长；所达地区之广远远超过了陆上“丝绸之路”。

自唐代中期以来，由于安史之乱和继之而来的藩镇割据，陆上“丝绸之路”往返遇阻，中国北方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而长期未能恢复和发展，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中国北方战乱不断，而南方各国处于相对和平与稳定状态，南方经济力量开始逐渐超过北方，北方的丝织业衰落了，沿海地区尤其是江苏、浙江的丝织业无论数量和质量上都后来居上。由于丝绸生产在南方的发展，促进了海外贸易；海上交通的发达，反过来又刺激了丝绸的生产。江南取代了河北、山东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自宋朝建立之后，更加重视发展海外贸易。而到南宋（公元1127—1279年），“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成了朝廷的生命线。朝廷南迁后，经费困乏，一切倚靠海船收入。在唐朝设置“市舶使”的基础上，宋代开始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等地设置“市舶司”，主管海外贸易事务。广州、泉州、扬州、明州、杭州等都发展成国际贸易城市，外商侨居这些城市也日益增多，以至有专门的外商居住区域称为“蕃坊”。当时人描述说：“舶交海中，不知其数。”商船往来之多于此可见。在繁华喧闹的夜市，不断夹杂着异国的声音。

唐代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从广州已远航到波斯湾。这条航线唐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海船以广州为起点，经南海，入印度洋，终止在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程约需三个月。这条航线开始把中国和以室利佛逝为中心的南洋地区、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中心的阿

拉伯地区联系在一起。虽然在晚唐、五代由于战乱和政局不稳，这条航线曾一度冷落，可是不久就恢复了繁荣，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造船技术的发展和指南针运用于船舶导航，中国的海船更加巨大，乘风破浪活跃在南海航线上。宋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已发展到亚丁和东非沿岸。

地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元）的建立，使得陆上“丝绸之路”重新畅通。从帝国的中心元帝国到四大汗国，沿途驿站林立，通行无阻。“海上丝绸之路”更是达到了全盛时期。“当时所有印度、中国的交通皆操于中国人之手。”（伊本·巴图泰语）南海航线基本上和宋代相似，从广州至阿曼湾除了经霍尔木兹海峡至忽鲁模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和波斯湾西端的波斯离（今伊拉克巴士拉）以外，还辟有南下至祖法尔（今阿曼佐法尔），经亚丁湾，入红海至麦加，西行到开罗，或南下至东非，直至层摇罗（桑给巴尔岛）的航线。

这一切就为明代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打下了历史的和物质的坚实基础。

自从晚唐开始，在中西海上贸易的商品名单中，除了以丝绸为大宗商品外，又添上陶瓷器这一种远销亚非的畅销品。在从东南亚的菲律宾、中南半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远至东非、北非沿岸（即当年的南海航线沿线），各地的遗址中，都出土和发现了大批的陶瓷器残片。所以，有人把这条航线又称为“陶瓷之路”。从这条航线上，运回中国的大宗商品是香料，因此，也有“香料之路”之称。

但是，严格地说，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并不是唯一的航线。“海上丝绸之路”还应包括驶向朝鲜、日本的东海航线，以至横渡太平洋驶向美洲大陆的太平洋航线。

3. 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著名人物

自汉代开始，各国人民为征服海洋，开辟南海航线付出了巨

大的劳动和智慧，以至生命的代价。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运载的丝绸、陶瓷、香料，均为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的必需品。五彩缤纷的丝绸，把沿线联结起来，打破了隔阂，增进了了解，沟通了感情，推动了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给人们传送着和平与友谊。

汉武帝时，派出使者到东南亚各国访问，这是关于南海航线最早的记载。但是没有留下使者的姓名，以及他们出使回来的文字著作。三国孙吴时，康泰、朱应出使扶南，虽撰有专著，可惜全书已佚，只留下片段散见在其他著作中。第一个航行在南海航线上，并有著作保存下来的当推东晋高僧法显了。他是第一个对中亚海上交通作出贡献并有巨大影响的旅行家。在法显以后，附随商船往来于南海航线影响较大的人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几乎都是佛教徒。如扶南的僧伽婆罗、天竺的真谛三藏、金刚智、狮子国的不空三藏、唐僧义净等。第一个不是以宗教徒身份航行在南海航线上，并留下有影响的文字著述的应推唐人杜环。从他以后，有影响的旅行家、航海家已经不再是佛教徒了。这个变化也同海上贸易的变化相一致。自唐代中期以后，民间贸易开始兴起，官方贸易也逐渐改变为“朝贡贸易”的性质。日益变间接贸易为直接贸易。所以，从周去非著《岭外代答》开始，关于海外的著述更侧重于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天国已经落到人间，对胜地的仰慕已变为对商品的关注。

本册主要介绍几位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并为沿线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东晋的法显，唐代的义净、杜环，大食的苏来曼，宋代的周去非、赵汝适，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元代的周达观、汪大渊，摩洛哥的伊本·巴图泰和明代的郑和。

此外，还有一位杰出的旅行家，虽然他不是航行在南海航线上，却早在一千五百年前，渡过太平洋，抵达美洲的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一带，成为史籍记载中第一个访问美洲大陆的人，他就

是南朝时期的沙门慧深。

齐永元元年（公元449年），沙门慧深远游扶桑国，返回荆州（今湖北江陵）后，说“扶桑在大汉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多数学者考证认为，扶桑即墨西哥之龙舌兰。扶桑叶似桐，它的叶汁可酿酒，也可制糖，叶纤维强韧，耐腐蚀，可编绳缆，亦可织成布做衣服，⁵还是造纸的原料。（也有人认为慧深所说的扶桑，其实是古代原产美洲的玉蜀黍。）

在美洲的神话中，相传有一个人名叫凯察尔科阿特尔，意为“可尊敬的外来人”，他给当地带来了文化。许多人认为他就是慧深。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印第安人文化与亚洲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愈来愈多地发现从古代中国传去的文物，如秘鲁发现有汉文“太岁”字样的石碑；厄瓜多尔发现王莽时期铸造的钱币；加拿大临大西洋海岸上一石柱上有中国的篆字；墨西哥越万滔地方发现面部酷似中国人的泥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麦德西诺山峡发现一“中间有孔、大而圆”的石头。据美国考古学家认为“毫无疑问，这是来自亚洲早期的船锚”。据测定约为2000—3000年前之物。

尽管对慧深的事迹还是众说纷纭，但是，随着资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有朝一日总会拨开迷漫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太平洋航线上的浓雾，使人们看清它的真面目。

二、巡礼佛国的晋代高僧法显

1. 佛教东传

佛教创始于印度，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众说纷纭，已难稽考。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张骞通使西域，开辟了闻名后世的“丝绸之路”。张骞返回汉朝后，曾向汉武帝介绍了西域各国的山川物产，风土人情。“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傍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详见《魏书·释老志》）张骞并没有到过身毒（今印度），只是从大夏（阿富汗北部）人那里了解到印度的情况，很可能带回来佛教的信息。但是，此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自从“丝绸之路”畅通后，中西文化交流日渐频繁。随着使节商旅的不断往来，可以认为，在公元前后，佛教已东传到中国。经过中亚至中国新疆地区，然后再传入内地。

自西晋（公元265—316年）以来，在佛教徒中流传着“汉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大意是说：在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帝派遣使者张骞（或作蔡愔）等十二人（或作十八人）西行到大月氏国（古西域国名，在今甘肃敦煌与青海祁连县之间）访求佛道。这个传说的情节，各种记载虽然各有详略，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佛教正式传入我国内地之始。也说明佛教当时已在内地传播，并为统治阶级所接受。佛教初传内地，是作为西域商旅的宗教信仰进入的。汉朝统治者为了尊重侨居内地的西域商旅的宗教活动及为僧侣提供住所，而允许在城市内建立寺院进行宗教活动。自东汉（公元25—220年）末年以后近四个世纪内，除了西

晋的短暂的统一外，长期处于分裂割据，战乱频繁的局面。社会连续动乱不定和危机严重，正是宗教获得发展的温床。在苦难生活中挣扎的人们看不到摆脱苦难的道路，使幻想借助宗教得到精神安慰，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来世。自此以后慢慢才有汉人信佛教。佛教中关于人生无常、充满苦难的说教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也正适应了人们的悲观情绪。

佛教传入中国，至今还保存下来不少早期的佛教遗址，从新疆的克孜尔、甘肃的敦煌、山西的大同到河南的龙门等等著名的佛教遗址，都给我们提供了佛教经西北传入内地的例证。

自汉代以来，南海航线的开辟，海外贸易也发展起来。随着外商来华的日益增多，“海上丝绸之路”也成为佛教东传的一条渠道。1981年在孔望山辨认出一处佛教的摩崖造像，提供了证据。孔望山，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锦屏山（古称朐山）东北，相传孔夫子曾经登临此山以望东海，故称。造像依山崖的自然形势雕成，共可辨认出图像一百零五个。造像群的近中部位借用一块馒头山石，雕成高浮雕半身侧卧像，周围以阴线刻和浅浮雕的造型手法刻出男女老少五十余人，群像面向中心卧像，面露悲戚之状。这处造像和克孜尔、敦煌、龙门以及印度、中亚等地石窟现存的“涅槃”图有许多相似之处。造像时代约在东晋和刘宋（公元317—456年？）之际（也有人认为早到东汉末年）。

佛教在内地广泛传播，建立起许多佛教寺院。西晋永嘉年间洛阳有寺院四十二所。姚秦时长安僧尼数以万计，非常杂滥。不仅善男信女给寺院捐钱财、屋舍、田宅，而且得到朝廷的支持和赞助。寺院发展成为大地主，在它周围有许多领户，称僧祇户。这些情况要求有更多的律藏输入和译成汉文。佛教经典有经、律、论，称为三藏。律者法也，是对僧徒行为的规定和约束的法规，记载这些戒律的典籍称律藏。当时，翻译的律藏非常少，更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文。从法显所著《佛国记》自述中，也多次提到“法显本求戒律”而西行，“法显本心愿令戒律流汉地。”所以他西

行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寻求当时内地迫切需要的戒律。后来，唐代的义净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徇法之宾，法显师则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正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2. 法显西行

（1）法显的身世

法显是中国东晋时代（公元317—419年）的高僧，也是中国著名的旅行家和翻译家。公元334年，他出生在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垣）一个龚姓人家。法显在政局动荡，战乱不休的岁月中（其时经历五胡十六国，东、西晋及南北朝）度过了他的前半生，也是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开始他的佛国之行的。

法显有兄长三人，都在幼年夭亡。他的父母害怕他也遭不幸，在他三岁时，就送到寺院里当沙弥，以祈求佛祖的保佑。他十岁时父亲逝世，不久母亲也相继身亡，使他更虔诚地信奉佛教。二十岁时受大戒。他聪敏、正直、有志气，能严格地遵守教义对僧侣的约束，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当时还没有完整的戒律典籍，僧众无所遵循，有的甚至恃势胡为，不守清规。法显对此深有感触，便立志亲赴佛国，礼拜圣迹，寻求戒律。

（2）长安发迹 结伴同行

公元399年3月，年已六十五岁的法显，约同慧景、道整、慧石、慧嵬一行五人，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他们沿着河西走廊西行，当时河西走廊一带割据林立，所幸的是，这些割据一方的统治者多崇信佛教，所以法显一行得以顺利通过西秦的苑川、南凉的乐都抵达张掖。法显等人在张掖耽搁了一段时间。在这里，法显等和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五名僧徒相遇，这些人也是有志西行求法者，队伍便发展成十个人的巡礼团了。后来又

又有慧达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法显一行十一人，并没有能够在漫长的西行旅途中，一起走完全程，“发迹则结伴而行，还途则各散”，由于各种原因，有的中途折回，有的